

台湾地区莎士比亚戏剧研究的主体性回归

孙宇 张龙海

内容摘要: 莎士比亚戏剧在20世纪初日本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时期传入台湾。1945年以后,台湾莎剧研究回归到以中华传统文化为背景的中文语境。然而,自莎士比亚戏剧进入台湾一百多年来,莎剧研究作为台湾外国文学与戏剧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台湾地区的发展与流变,并未被大陆学者在整体上进行过全面论述与研究。本文重点考察莎士比亚戏剧在台湾的起源,以及台湾莎学与大陆莎学相比所经历的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从而全方位把握台湾莎士比亚戏剧的发展脉络,旨在呼吁大陆学者在加深对台湾莎士比亚戏剧研究的理解与把握的过程中,增强与台湾莎学界的交流与合作,在对莎士比亚戏剧进行文化挪用的同时,与台湾莎剧学者共同提升中国传统戏剧的品质,实现在全球化时代最大化地将中华文化进行对外传播,继而实现台湾莎士比亚戏剧研究的主体性回归。

关键词: 台湾 莎士比亚戏剧 中国大陆 主体性回归

中图分类号: J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943X(2019)02-0097-14

DOI:10.13737/j.cnki.ta.2019.02.008

Title: The Return of Subjectivity in the Studies of Shakespeare in Taiwan

Author: SUN Yu, ZHANG Longhai

Abstract: Shakespeare's plays were introduced into Taiwa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fter 1945, Taiwanese Shakespeare studies returned to a Chinese context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s the background. Despite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since the reception of Shakespeare in Taiwan, Taiwanese Shakespeare studie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field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d theatre studies has not been thoroughly explored by scholars from Mainland China. The paper emphasizes the origins of Shakespearean theatre in Taiwan and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tracks of Taiwanese Shakespeare studies compared with those in Mainland China, thus grasping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Taiwanese Shakespeare studies as a whole. The paper also calls for mor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Taiwanese Shakespeare studies, and appeals for joint efforts to elevate Chinese traditional Xiqu through the cultural appropriation of Shakespeare's play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globally. It calls for the return of subjectivity in Taiwanese Shakespeare studies.

Key words: Taiwan; Shakespeare's plays; Mainland China; return of subjectivity

在 21 世纪以前,西方主流莎学并不看重亚洲国家(地区)对莎士比亚戏剧的跨文化演绎。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日据时期,台湾对莎士比亚的接受是日本殖民统治强力干预的结果。抗日战争结束,台湾回归到中文语境,使得莎士比亚研究可以在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开展。通过对台湾地区莎学的研究可以看出,莎士比亚戏剧在同一语言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地区及年代里,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但均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民风国情和文艺批评潮流,在不同时期,中国大陆与台湾民众对莎剧的接受程度也存在着很大差异。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亚洲人口占全球比重逐年增多以及中国在经济和文化影响力方面的提升,以中国传统戏曲形式改编的莎剧越来越受到西方主流莎学的重视。当印度学者鲁斯顿·巴鲁查(Rustom Bharucha)对英国著名戏剧导演彼得·布鲁克由印度史诗改编的跨文化戏剧《摩诃婆罗多》进行批判,称“它是以西方、欧洲为中心,对非西方文化、印度文化的一种掠夺”^①之际,法国著名戏剧导演阿丽亚娜·姆努什金也“借助东方表演艺术探索新形式,试图通过程式化的表演来展现莎士比亚的语言”,^②那么,海峡两岸莎学学者对于被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称之为“西方正典”的莎士比亚戏剧进行研究则更显必要。对闽台戏剧有过深入研究的我国戏剧人类学专家陈世雄就曾指出:“世界上大概很难找到一个像台湾这样的地区,其戏剧与政治的关系竟然是如此错综复杂。”^③一直以来台湾戏剧的发展与大陆息息相关,难分彼此。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两岸莎学界建立起紧密联系与合作交流平台,在亚洲和国际莎学研究界,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研究实体,才能发出真正属于中华学者的声音。

目前,中国大陆莎学并没有对台湾莎士比亚戏剧从接受史、剧本翻译、莎学研究、改编表演和数字化时代的对外传播等方面全面系统地展开研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对台湾莎士比亚戏剧的研究意义重大。随着台湾莎学国际化进程的深入,现在已经到了打破两岸文化与学术研究的藩篱,让台湾莎士比亚戏剧研究回归大陆学者学术视野的时

①周夏姿:《跨文化戏剧的政治性与艺术性——评巴鲁查论〈摩诃婆罗多〉》,《戏剧》,2015年第5期,第18页。

②罗磊:《1980年代太阳剧社莎士比亚戏剧改编——重塑莎剧文本与借用东方艺术形式》,《戏剧》2019年第一期,第105页。

③陈世雄:《台湾戏剧三题》,《闽台戏剧与当代》,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4页。

刻。大陆学者对台湾莎剧的起源与莎剧改编新动态的了解与掌握,可以增强台湾莎学与大陆莎学的对话,加强两岸戏剧界与莎学界的交流与合作,有助于共同推动中国传统戏曲借助莎剧文化在全球的传播与发展。

一、日据时期台湾莎剧表演的起源

在清末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之后,台湾于1895年被清政府无条件割让给日本。从19世纪末开始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1895-1945)台湾就已经开始受到莎剧文化的影响。“西方戏剧在19世纪70年代被引进到日本,并以改良的歌舞伎形式进行表演。根据明治时代对西方戏剧的翻译可以看出,莎士比亚是当时日本最受欢迎的西方剧作家。”^①据记载“在1877-1890年间,莎士比亚戏剧的35个翻译版本在日本出版。”^②这一时间明显早于中国大规模译介莎剧的起始时间。正是受日语莎剧全集翻译的影响,才有了朱生豪在1936年出于为国争光而进行的中文莎剧翻译。根据日本著名中国话剧史专家濑户宏在2017年出版的《莎士比亚在中国——中国人的莎士比亚接受史》中对日本莎士比亚接受史的介绍,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在日本发起“正剧运动”的导演川上音二郎(Kawakami Otojiro)的剧团上演《奥赛罗》^③,该剧舞台背景被设置在了明治时期的日本和台湾,原剧中奥赛罗征战的塞浦路斯被改编为澎湖岛^④,摩尔人奥赛罗被改编为部落民出身、为日本天皇在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总督室鹭郎(Muro Washiro),而伊阿古的日本名字为伊屋刚藏(Iya),苔丝狄蒙娜被改编为财政大臣的女儿鞞音(Tomone),其角色由川上音二郎的妻子——日本第一位现代女演员川上贞奴(Sadayakko)饰演。这部改编版莎剧《奥赛罗》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内部封建的种族观念和残酷的阶级划分,以及台湾原住民被迫接受日本殖民统治后所受到的种族歧视。日本莎学专家吉原由香里(Yukari Yoshihara)曾在2014年发表“‘Raw-Savage’ Othello: The First-Staged Japanese Adaptation of Othello (1903) and Japanese Colonialism”(《未开化的野蛮人奥赛罗:日本首次上演的〈奥赛罗〉与日本殖民统治》)一文,她尖锐地指出:“这种改编借用《奥赛罗》在全球的权威性来满足日本帝国在本土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需要,以此来确立日本国家的、种族的、阶

①Takiguchi Ken. “Negotiating Authenticity: Translating Shakespeare in Asian Traditional Performance Styles for a Digital Archive”. *Contemporary Tradition—Japanese Performance Genre Today*. 2016. p. 3.

②Yamamoto, Sumiko. Eibei Engeki Inyukō. (On Introduction of the Western Theatre to Japan) [M]. Tokyo: Bunka Shobō Hakubunsha. 1992. p. 40.

③濑户宏:《莎士比亚在中国——中国人的莎士比亚接受史》,陈凌虹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77页。

④1895年日本海军在此登陆,开始了对台湾的殖民统治。

级的沙文主义”，并抨击到：“这次改编是对莎士比亚戏剧不道德‘滥用’的清晰案例。”^①确实如吉原由香里所言，从当代视角来看，台湾原住民的歌舞被搬上《奥赛罗》的舞台，歌词中台湾原住民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歌颂与感激，是对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极大讽刺。在台湾也有多位学者曾经对这部《奥赛罗》与台湾的关系进行过深入研究：如石婉舜的《川上音二郎的〈奥赛罗〉与台湾——“正剧”主张、实地调查与舞台再现》在大陆以《帝国制作：川上音二郎的〈奥赛罗〉与台湾》为题发表在《艺术评论》（2008年第1期）。文章描述了1902年年末川上音二郎为以台湾背景改编《奥赛罗》而远赴台湾所进行的实地考察，在分析了剧本情节所展现的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台湾人民的歧视之后，重点指出这部《奥赛罗》揭示了20世纪初“日本的剧场工作者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之间的共谋关系”，并深刻揭露“川上音二郎的剧场作为文化机器，膨胀日本人的国族想象之余，也助长其殖民统治台湾的合理性。”^②凭借《奥赛罗》在日本取得的巨大成功，根据《台湾日日新报》日文版记载，1905年该剧原班人马赴台表演了这部具有殖民主义性质的《奥赛罗》。1911年为替日本殖民统治者向台湾输入新式教育思潮，已经名声大振的川上剧团赴台北演出新式儿童剧，开启了台湾新式戏剧的时代。随后，其他日本后继者陆续赴台，对台湾戏剧创作以及观众的接受与鉴赏力影响至今。台湾东吴大学日本语文学系吴佩珍用日语撰写的论文《莎士比亚翻案剧及台湾表象——以日本〈奥赛罗〉以及台湾〈暴风雨〉为中心》，通过分析在日本上演的第三部莎剧，即《奥赛罗》（1903）来唤起台湾人民对这段殖民历史的回忆以及通过台湾当代传奇剧场改编的《暴风雨》来展示在后殖民时期的当代台湾各族群之间的矛盾冲突，来揭示自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至现今台湾与外来政权的关系。^③

日本当时在台湾的殖民政策与其推行英美文化的教育方针对莎剧在台湾的推广起到了一定作用。根据台湾学者陈怡伶的研究，日据时期莎剧在台湾的传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日据初期（1895-1915）的莎剧以日语演出，这种观演关系是被统治者被迫接受文化统治的关系。在日据中期（1916-1936），日本政府在中学以上教育中推广英语，使台湾民众受到了莎剧启蒙，普通民众可以通过日文阅读莎剧翻译，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英文阅读莎剧原文。日据后期（1937-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政府禁

① Yukari Yoshihara. “‘Raw-Savage’ Othello: The First-Staged Japanese Adaptation of *Othello* (1903) and Japanese Colonialism” [J]. *Shakespeare and the Ethics of Appropriation*. 2014. p. 145.

② 石婉舜：《帝国制作：川上音二郎的〈奥赛罗〉与台湾》，《艺术评论》，2008年第1期，第78页。

③ 吴佩珍：《莎士比亚翻案剧及台湾表象——以日本〈奥赛罗〉以及台湾〈暴风雨〉为中心》，《东吴外语学报》，2007年第25期，第59页。

止英语教育与英美文化传播,政治形势和教育政策的转变使莎剧在台湾的发展受到控制,但这一时期,作为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抗,台湾报纸上间或有莎剧剧评出现,本土学生对莎剧也有零星演出。^①

关于20世纪上半期日据时期台湾的政治和历史背景对莎剧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台湾学者还是日本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有待深入。2013年,台湾师范大学许俊雅在《四川外语学院学报》发表论文《莎剧故事在台湾早期的流播与接受》,对20世纪初林纾、魏易译自兰姆姐弟《莎士比亚故事集》(*Tales from Shakespeare*, 1807)而成的《吟边燕语》(上海:商务印书馆,1904)在台湾的传播和改写情况做以详细考证,论证“日据时期”台湾汉文界受到林纾对莎剧故事翻译与改写的影响,对莎剧有了最初的认识。因此,日本对台湾的教育政策是否使日语莎剧在当时得到台湾民众的主观认同并使莎剧在台湾扎根这一问题仍需要今后进一步考证,但正是在国民党光复台湾之后,台湾的莎剧研究才得以用中文开展,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莎学研究中才得以渗透与展露。综上所述,台湾在日据时期的莎剧表演与日语莎剧翻译对台湾莎学的影响研究意义重大,这一研究将台湾莎学的起始时间向前推进50年。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将莎士比亚戏剧引入台湾是不容被忽视的历史事实,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当代台湾莎剧研究的走向。

二、台湾中文莎学研究的回归

根据中国大陆莎学专家李伟民对台湾中文莎学研究起始时间的界定,台湾中文莎士比亚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这时从事莎著翻译和莎学评论的主要是从大陆去台湾的学者、教授,其中以梁实秋、虞尔昌为代表。”^②到20世纪末,在台湾发表莎学论文较多的学者为梁实秋、朱立民、颜元叔和彭镜禧。曾历任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③主任的朱立民、颜元叔和彭镜禧在美国接受教育后返台,均对莎士比亚在台湾地区不同时期的连续推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朱立民和颜元叔两位先生是当时台湾屈指可数的英美文学博士,二人主管外国语文学系期间,锐意改革,对日后台湾英美文学、比较

①陈怡伶:《台湾日治时期莎剧之研究及其在英语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1895-1945)》,台湾“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项目报告(2010-2011),第1页。

②李伟民:《台湾莎学研究情况综述》,《西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65页。

③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作为台湾莎学研究的大本营,前身隶属于民国十七年(1928)在台湾创办的日本台北帝国大学文学部,民国三十六年(1947)正式成立国立台湾大学外国文学系,民国四十四年(1955)更名为外国语文学系。

文学教育及莎士比亚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人称“朱颜改”^①。彭镜禧教授是台湾莎学界备受敬仰的学者,曾在2004年起连续多年组织召开台湾大学莎士比亚论坛(NTU Shakespeare Forum)。在2004年,由彭镜禧主编的《发现莎士比亚——台湾莎学论述选集》展现了世纪之交台湾莎学研究的“枝繁叶茂”的盛况。他在代序中回顾了从1966年梁实秋主编《莎士比亚诞辰四百周年纪念集》开始至21世纪初台湾莎学发展的长足进步,并指出所存在的莎剧版本研究不足和对几部著名莎剧在研究上有所偏重,对其他莎剧论述较少的问题,并表达了对未来“较具规模、较为宏观、较有系统的”^②莎学专著的期待。彭镜禧除了在莎学方面研究深入,在莎剧翻译和莎剧改编方面也建树颇多,到目前为止,翻译莎剧八部,并与台湾师范大学陈芳教授合作,以中国传统戏曲形式分别把《威尼斯商人》、《一报还一报》和《李尔王》改编成豫莎剧《约/束》(2009)、《量·度》(2012)和《天问》(2015),并把“失传”莎剧《卡丹纽》改编成“类京剧版”^③(2013)和客家大戏版《背叛》(2014),并将改编的莎剧作品积极推向英美国家进行巡演,令国际莎学界展开对“莎戏曲”(Shake-xiqu)的热议与关注。同时,彭镜禧也是台湾莎学专家中与大陆莎学界联系最多的学者。

相比大陆学界对台湾莎学与莎剧表演的极少关注,台湾学者对大陆莎学专家的翻译与研究则持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在朱生豪对莎剧翻译的基础上,虞尔昌补译了朱生豪未译完的莎士比亚历史剧,1957年由台北世界书局出版。之后,梁实秋以一人之力历时37年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67),成为迄今为止独自翻译莎翁全集的唯一中文译者。这两个版本的莎剧全集作为台湾莎剧翻译的典范,加之大陆翻译家卞之琳、孙大雨、方平、辜正坤等人的翻译在两岸相继出版,又引发了一批台湾学者和翻译家对莎剧的重新翻译,包括夏翼天译《朱立奥该撒》(包含《卡丽欧黎纳士》)(台北:广文书局,1955);杨世彭译《驯悍记》(《中外文学》,1982)、翻译并导演《威尼斯商人》、《无事生非》、《李尔王》和《仲夏夜之梦》;黄美序译《李尔王》(《中外文学》,1987年);吕健忠译《马克白》(逐行注释新译本)(台北:书林出版社,1999);李魁贤译《暴风雨》(台北:桂冠出版社,1999);杨牧译《暴风雨》(台北:洪范出版社,1999);彭镜禧译注《哈姆雷》(台北:联经出版社,2001年)、《威尼斯商人》(台北:联经出版社,2006年)、《量·度》(台北:联经出版社,2012年)、《卡丹纽》(台北:书林出版社,2013)、《李尔王》、《暴风

①彭镜禧:《纪念恩师颜元叔教授》,《中国莎士比亚研究通讯》,2013年第1期,第95页。

②彭镜禧:《枝繁叶茂的台湾莎学》,《发现莎士比亚——台湾莎学论述选集》,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04年,第9页。

③陈芳:《全球在地化的〈卡丹纽〉》,《中国莎士比亚研究通讯》,2014年第1期,第17页。

雨》、《皆大欢喜》、《快乐的温莎巧妇》(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等。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第二任会长方平曾经对彭镜禧“求形存真”^①的莎剧翻译给予高度评价。

自1986年,台湾当代传奇剧场以京剧改编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形成作品《欲望城国》之后,台湾地区便开始了大规模的莎剧改编。以吴兴国、李国修、纪蔚然等导演与剧作家为中坚力量的一批莎剧工作者们不断尝试以莎戏曲和实验话剧等形式,挑战和颠覆莎剧经典,赋予解读莎士比亚剧作以一种崭新方式。台湾的莎剧改编与演绎之所以盛行,是由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吴兴国为首的一批年轻戏曲演员在受到西方戏剧思潮影响之后,出于使戏曲能够吸引年轻人,并具有新的吸引力为目的,在中国戏曲中加入了西方经典元素,进而对传统戏曲进行改革。另外,对于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台湾新一代文艺知识分子,包括受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影响的年青人,他们“需要从西方经典入手来认知自己的文化。”^②对莎剧的改编与演绎改变了台湾当代剧场的面貌,也促使更多的年轻学者投入到莎学研究中,从而使跨文化剧场研究在台湾学界不断升温。

台湾所改编的莎剧表演主要在创新与突破中亦融入中国传统戏曲精粹,为中国戏曲在世界戏剧舞台上的传播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实际上,“‘跨文化戏剧’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戏曲界非常突出的文化现象。”^③台湾传统戏曲与莎士比亚研究专家陈芳曾在其著作《莎戏曲:跨文化改编与演绎》中对“莎戏曲”给出了明确定义,是指“从莎士比亚戏剧改编而成的中国传统戏曲”,“是亚洲莎剧跨文化剧场研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个案”^④。她提出在对莎士比亚戏剧复杂的跨文化改编过程中,要注意五个改编要点:即“文化的转移”、“剧种的特性”、“情节的增删”、“语言的对焦”和“程式的新变”^⑤,并对改编莎剧作为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戏剧主体性问题做了重点阐释。可以看出,所谓“莎戏曲”就是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对莎剧的改写。那么,对“莎戏曲”(Shake-Xiqu)概念所展现的社会现实意义进行深入挖掘可得出:在文化翻译视角下,改编从广义上来说也是对原剧的一种翻译。通过改编,原剧的文化背景被移植到目标文化中,这并不是强势文化体系的单方向流动,而是两种文化体系之间的互动。诚如我国著名跨文化戏剧专家俞建村

①方平:《目光犀利,周密精深,卓然一家——喜读〈细说莎士比亚论文集〉》,彭镜禧著,《细说莎士比亚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Ⅲ页。

②刘亮廷:《被框架的“传统”与“创新”》,《上海戏剧》,2010年第9期,第8页。

③邹元江:《论新概念昆曲〈邯郸梦〉跨文化戏剧坚守戏曲主体性的尝试》,《戏剧》,2019年第1期,第120页。

④陈芳:《莎戏曲:跨文化改编与演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第2页。

⑤同上,第8页。

所指出：“文化关系不是一种上下级关系，而是一种双向平等的关系”^①。在跨文化戏剧中，目标文化的传统、剧种的选择、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对原剧语言的全新阐释都会使“剧场译作”立足于目标文化的自身传统，转而向外部展现跨文化戏剧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并产生新的影响力。

在对改编莎剧从表演到研究进行深度尝试之后，台湾莎学学者也对保存改编莎剧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彭镜禧建立了“台湾莎风景”（Taiwan Shakescene）；前台湾大学外文学院雷碧琦创建“亚洲莎风景”（shakescene.asia）网站，以对比同一部莎剧场景在不同亚洲国家改编演绎过程中的变化，以及台湾莎士比亚资料库（Taiwan Shakespeare Database），该资料库的建立可以将改编上演的莎士比亚戏剧的剧照、视频、剧评等资料永久保存，为教学研究留下长久的可利用资源，极大地促进了改编莎剧的对外传播，以及推动本土跨文化戏剧研究的未来发展。美籍台湾裔学者黄诗云（Alexa Alice Joubin）与美国学者彼得·唐纳森（Peter Donaldson）于2009年4月在麻省理工大学（MIT）建立SPIA（Shakespeare Performance in Asia）亚洲莎士比亚表演资料库。这些工作说明台湾莎学正在面向全球积极地展开互动，并分享其研究成果，带有浓重中华民族风格的台湾“莎戏曲”展现出一种浓烈的东方美学。2016年3月，台湾静宜大学以陈怡伶为核心的，包含有两位日本专家南隆太（Ryuta Minami）和吉原由香里的莎学专家团队在台湾全民终身学习互联网平台上开展了为期近三年的MOOC“全球化/在地化莎士比亚”全球免费共享网络教学活动。该课程以日本漫画（manga）形式改编的莎士比亚文本为依托，讲述剧情、角色表演、分析如何上演莎剧场景和进行莎士比亚日本动画改编，将持续到2018年12月。2016年末，使台湾莎学走向国际化的雷碧琦与菲律宾学者朱迪·席琳·艾克（Judy Celine Ick）和印度学者普南·特里维迪（Poonam Trivedi）主编的论文集*Shakespeare's Asian Journeys: Critical Encounters, Cultural Geographies, and the Politics of Travel*（Routledge, 2016）（《莎士比亚的亚洲之旅：批判性遭遇、文化地理学与旅行的政治》）由劳特利奇公司出版。可以看出，彭镜禧、雷碧琦、黄承元和陈怡伶等台湾莎学专家近年来在亚洲乃至国际莎学界均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事实上，在近年来台湾开展“学术全球化”战略之后，越来越多的台湾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了台湾学术的声音。美籍台湾裔著名导演杨世彭担任美国科罗拉多州莎士比亚戏剧节（Colorado Shakespeare Festival）艺术及行政总监长达十年。作为第一位在西方世界长期主掌职业莎士比亚剧团的亚裔人士，自1978年起他即应邀担任英国国际莎学

①俞建村：《谢克纳与印度——跨文化的演绎与争议》，《戏剧艺术》，2009年第2期，第4页。

会议永久会员,是华人中首位加入这个深具国际声望学术团体的学者,其在大陆学术界也发表戏剧研究论文多篇。上文提到的莎学学者黄诗云在2004年发表其在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论文 *Shakespeare on the Chinese stage, 1839 - 2004: A History of Transcultural Performance* (《中国舞台上的莎士比亚(1839-2004)》, Stanford University, 2004);她还出版专著 *Chinese Shakespeares: Two Centuries of Cultural Exchange*. (《莎士比亚的中国旅行:两个世纪的文化交流》New York: Columbia UP, 2009),对莎士比亚进入华语世界之后的中国化过程做了梳理,论述了中国大陆在包括抗日战争时期和文革时期在内的各个历史阶段所上演莎剧的情况,并强调了在全球化时代莎士比亚本土化所带来经济与文化的动态发展;并与查尔斯·罗斯(Charles S. Ross)合作出版论文集 *Shakespeare in Hollywood, Asia and Cyberspace* (《莎士比亚在好莱坞、亚洲与网络空间》,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9)。台湾莎学学者在境外用英语出版的大量专著和发表的论文对台湾莎学与国际莎学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起到了良好的沟通作用。

台湾的莎学组织近年来发展迅速。2012年年末,台湾莎士比亚学会在雷碧琦、彭镜禧教授等台湾莎学专家号召下成立。2013年作为台湾莎士比亚研究会的创会理事长雷碧琦又与菲律宾、中国、新加坡、印度、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学者一起发起亚洲莎士比亚学会,并成为现任亚洲莎士比亚学会理事长。2014年亚洲莎士比亚学会在台湾大学召开第一次年会、2016年在印度新德里大学召开第二次年会,2018年在菲律宾马尼拉大学召开第三次年会。中国大陆莎学专家参与了亚洲莎士比亚学会初创时期的筹备工作,但在第二次执行委员会选举之后,成员基本由台湾、菲律宾、日本、韩国、印度和新加坡等国(地区)的学者为主,中国大陆学者较少。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在亚洲影响莎学研究交流与合作的政治性因素仍然存在。

三、台湾莎士比亚戏剧研究回归的必要与保障

在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后,台湾于1987年解严,海峡两岸的政治束缚有所缓解,但在大陆出版的包括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筹编的《莎士比亚研究》(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在内的以“莎士比亚在中国”为主题的著作,都没有把台湾莎士比亚戏剧研究包括在内。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台湾在政治上对大陆的疏离,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两岸学术界的沟通与交流。

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成立于1984年,虽与台湾莎学组织相比成立时间较早,但却经历了颇为曲折的发展过程。2003年6月6日民政部突然宣布全国63个学会(包括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因为未按期进行重新登记而被取消活动资格。之后,经过我国莎学研

究者十年的努力,2013年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莎士比亚研究分会在北京大学成立,分别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在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和河南大学召开三次年会。在莎剧表演方面,中国曾经分别于1986年、1994年举办了两届莎士比亚戏剧节。对中国莎学倾注了一生心血的孟宪强教授曾记载“早在1994年中国上海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之际,大会组委会就邀请了台湾近40人参加,同时台湾李国修主持的‘屏风表演工作坊’和上海‘现代人剧社’合作演出了根据《哈姆雷特》改编的别具风格的《莎姆雷特》。”^①1995年中莎会常务副会长孙福良一行访问台湾各高校,与台湾莎学专家朱立民、胡耀恒、杨万运等20多位教授、博士和学者座谈,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关系。时隔22年之后,2016年,在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之际,上海戏剧学院举办了被称为中国第三届莎士比亚戏剧节的小剧场戏剧节,其中并没有台湾地区的莎剧作品展示。2005年—2014年间在香港中文大学连续举办的十届中国大学莎士比亚戏剧节中,台湾多所高校精彩演绎了多部莎剧,频频获奖,但该戏剧节现已停办。2003年至2013年,在中国大陆莎学组织被取缔的十年内,台湾地区莎士比亚戏剧却得到了飞跃性发展。

相比台湾莎士比亚资料库的数字化建设,大陆莎学界在保存莎士比亚戏剧资料方面的工作还未起步,1986年、1994年和2016年的三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的作品信息,除了在个别学术论文中有所提及,在网上无法查阅与观看。大陆导演如林兆华、谷亦安、何念及香港导演邓树荣等所执导的莎剧视频资料只能交由新加坡大学于2011年3月建立的“亚洲莎士比亚跨文化网络档案库”(Asian Shakespeare Intercultural Archive)或麻省理工大学建立的“全球莎士比亚资料库”(Global Shakespeare Archive),以供全球同行和戏剧爱好者们在互联网上观看。台湾莎士比亚资料库的建立为大陆戏剧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戏剧研究有着很强的即时性,戏剧演出与电视、电影等艺术形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其现场演出的场次和每场的观众数量都非常有限,直接影响到其对外传播的力度。一部莎士比亚戏剧从改编、到导演的构思、舞美的设计、再到演员的理解、消化与演绎,服装道具的配备,整个剧组人员付出很多心血,莎剧作品若被录制成视频资料出版发行或上传互联网,其影响力将大大增加,同时也会增加国内戏剧工作者们与国际同行之间互相交流切磋的机会。综上,在莎剧研究资料数字化和莎剧表演对外传播方面,台湾莎学界所做的努力已经远远超出大陆莎学界目前的状态。近年来两岸莎剧演出的联系与互动,优势与互补无不显示着台湾莎士比亚戏剧研究回归大陆学术视野的必要。

^①孟宪强:《一次承前启后的莎学盛会——莎士比亚在中国演出与研究国际研讨会》,《四川戏剧》,1999年第2期,第6页。

进入21世纪以后,在公共文化空间中,大陆知识分子经过对历史的反思,整体上,对于台湾学者的学术成果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也使台湾学者的思想影响力在大陆得以逐渐解开封锁。然而,在莎剧研究界大陆学者与台湾学者所做研究之间的界限似乎还是泾渭分明,各自为本,并没有体现出“两岸一家亲”的局面。实际上,在“九二共识”之后,两岸关系开始了良性发展,在2000年4月底前台湾当局大陆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苏起正式提出“九二共识”这一名词之后,两岸在文化、艺术、经济贸易等各领域的交流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由历史问题造成的缺憾正在逐渐得到弥补。

在2017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要以服务国家改革发展和对外战略为根本,以促进中外民心互通和文明互鉴为宗旨,创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改革各领域人文交流内容、形式、工作机制,将人文交流与合作理念融入对外交往各个领域。”^①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指出:“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并进一步表示“两岸同胞要共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②可见,在中外人文交流已受到国家高度重视的同时,习总书记对台湾问题所发表的重要讲话也为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开展莎学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保障。

四、两岸莎剧研究的互动与局限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著名莎学专家杨林贵作为国际莎士比亚学会执行理事,与国际莎学界积极开展了很多合作,与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布鲁克斯(Douglas Brooks)合作编写莎士比亚年鉴《莎士比亚与亚洲》(美国埃德文梅林学术出版社,2010年),其中包含了台湾学者邱锦荣、雷碧琦、林境南的文章;并撰写论文《莎剧改编与接受中的传统与现代问题——以莎士比亚的亚洲化为例》(《四川戏剧》,2014年第1期)等,对莎士比亚作品在亚洲的接受与莎学在亚洲的发展做了深入挖掘。莎学专家张冲主编的《同时代的莎士比亚:语境、互文、多种视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包含了台湾大学戏剧系彭镜禧和

①王萌萌责编:《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新华网,2017年12月21日,网址: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12/21/c_1122148432.htm

②牟彦秋责编:《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9年1月2日,网址:http://www.xinhuanet.com/tw/2019-01/02/c_1210028622.htm

朱静美的文章。在大陆莎学专家中李伟民对台湾莎学研究颇多,其出版的《光荣与梦想:莎士比亚在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和《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等作品均对以梁实秋为代表的台湾莎学研究有所论述,特别是在《中西文化语境里的莎士比亚》(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的第六章“莎士比亚在当下中国”中把“台湾的莎学”单列为一节进行讨论,在《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莎学知音思想探析与理论建设》(重庆出版社,2012)中对梁实秋莎评做了详尽的论述。

在整体上,与台湾莎学学者相比大陆莎学学者用英文在国际重要莎学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有限,从而限制了中国莎学的对外影响力。“客观地说,莎士比亚戏剧的价值还没有被我们认识到”^①,不仅如此,大陆莎学学者对台湾学者的莎学研究也十分有限。历年来,大陆学者对台湾地区整体莎学研究的相关论文数量极为有限,只有现任中莎会副会长李伟民撰写的1篇《台湾莎学研究情况综述》(《西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其他大陆学者关于台湾莎学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梁实秋译《莎士比亚全集》和梁实秋莎评的讨论,如河南大学李伟昉对梁实秋做过持续研究,出版专著《梁实秋莎评研究》(北京:商务印刷馆,2001),并发表相关论文《论梁实秋与莎士比亚的亲缘关系及其理论意义》(《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梁实秋莎评特色论》(《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等。其他学者发表的台湾莎学研究论文也都围绕梁实秋翻译观、梁实秋戏剧观、梁实秋莎评特色、梁实秋译文与朱生豪等版本译文的对比和梁实秋与鲁迅翻译思想比较等展开,共9篇论文。另外,大陆发表的有关台湾莎剧翻译家虞尔昌的文章只有2篇,分别由中莎会前任会长方平先生撰写的《虞尔昌与莎剧全集》(《书城》,1994年第9期)和虞尔昌表兄朱子南撰写的《续译莎氏剧作的虞尔昌》(《世纪》,2000年第1期)。大陆对台湾莎学专家朱立民和颜元叔没有相关研究发表。关于台湾莎剧改编方面大陆学者撰写的论文也屈指可数:李伟的《西体中用:论吴兴国“当代传奇剧场”的跨文化戏剧实验》(《戏剧艺术》,2011年第4期)、张松婷的《简评梆子戏〈约/束〉》(《戏剧之家》,2015年第4期)和申妍的《台湾当代传奇剧场创团作品〈欲望城国〉在京津两地上演》(《台声》,2017年第10期)等。在大陆发表的台湾学者在莎剧改编方面的论文有15篇,其中5篇由彭镜禧撰写,5篇由杨世彭撰写,3篇由陈芳撰写,1篇由陈淑芬撰写,1篇由刘亮延撰写。

针对中国大陆莎学与台湾莎学的关系问题,近年出版的以“莎士比亚在中国”为主题的著作中均有所展现。现居英国的莎学学者张晓阳在美国出版的 *Shake-speare in*

^①李建平:《莎士比亚剧目在教学中的意义与作用》,《戏剧艺术》,2017年第5期,第62页。

Chin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Traditions and Cultures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96) 和英籍华裔学者李茹茹的 *Shashibiya: Staging Shakespeare in China* (Hong Kong UP, 2003) 都没有包含台湾莎士比亚研究, 但 2004 年美国学者穆雷·莱维斯 (Murray Levith) 出版的《莎士比亚在中国》(*Shakespeare in China*) 则在第 5 章中对莎士比亚在中国香港和台湾的接受情况做了详细介绍, 首次扩大了该研究的范围。2010 年, 中国学者孙艳娜出版英文博士论文 *Shakespeare in China* (《莎士比亚在中国》)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其中关于台湾部分介绍了梁实秋的莎剧翻译。2013 年, 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 艾柯·劳班 (Eko Fiza Laukaban) 的博士论文 *From China to Taiwan: Occidentalism in Contemporary Sino-Shakespeare* (《从中国到台湾: 当代中国莎士比亚的西方主义》, 2013) 论述了中国、台湾和西方的莎士比亚之间的三角关系, 并通过分析以中国中心主义和西方主义作为主宰改编者和莎士比亚之间对话的元叙述, 试图为今后研究华语世界莎士比亚改编建立一种范式。日本学者南隆太与黄诗云合作出版的 *Shakespearean Adaptations in East Asia: A Critical Anthology of Shakespearean Plays in China, Japan, Korea, and Taiwan* (5 Volume Set) (Taylor & Francis, 2019) (《东亚的莎士比亚作品改编: 中国、日本、韩国和台湾莎士比亚剧目精选, 5 卷集》) 把中国与台湾分为两卷编写。2016 年出版的中国莎学学者李军的英文专著 *Popular Shakespeare in China: 1993 - 2008* (北京: 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并没有提及台湾莎学的情况。2017 年, 日本著名中国戏剧史专家濂户宏撰写的《莎士比亚在中国——中国人的莎士比亚接受史》(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7) 中文版出版, 他在书中简要提及了台湾莎剧的接受情况。

实际上, 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莎剧研究同属在汉语语言体系之下,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 以中国传统戏曲为主要改编形式, 两者一脉相承, 互为补充。台湾莎士比亚研究作为亚洲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不应被大陆学者忽视, 更不应被历史问题所阻隔。时代已经发展到了两岸莎学互通有无、共同进退的时刻, 但两岸莎剧学者对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深感无奈。到目前为止, 由于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互联网仍未完全开放, 导致如台湾莎士比亚研究会等重要网站在大陆无法打开。两岸在学术交流方面仍没有实现全面互通, 因而, 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 包括专著和论文集在大陆很难买到, 这些都是两岸莎学极少沟通的原因之一。另外, 台湾政治形式复杂, 台湾学者难免会与大陆学者在某些观念上发生政见不一致的情况, 这也为开展莎学研究带来一定程度的困难, 但笔者相信只要用心在学术交流过程中注意语言表达方式, 尊重他们的政治观点, 理解他们的身份认同焦虑, 站在团结台湾同胞的立场来表达学术观点, 随着交流增多、信任加深, 这一困

难应该是可以克服的,由历史遗留问题所造成的两岸莎学之间缺乏沟通与交流的状态将会得到及时有效的弥补。

五、结 论

自莎士比亚戏剧进入台湾之后,台湾历年的莎剧翻译、莎学研究和莎剧表演均反映了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回归。在以莎剧为代表的西方强势文化对台湾地区传统文化进行全面辐射之后,回归到中华文化背景下的“莎戏曲”将会以全新的姿态对全球文化产生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现象。实际上,跨文化改编与演绎的重点并不在于是否忠于原著,而在于改编与演绎后的作品是否在自身文化传统中展现了独特的创意和构思。随着今后台湾莎剧研究全面回归到大陆学者的研究视野,两岸学者共同对如何“在比较中认识中国戏曲的主体性,保护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①、如何更好地在莎剧改编中融入中华文化精髓、如何在网络数字化时代以全新的莎剧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海峡两岸莎剧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才能得以建立。台湾莎剧研究的主体性回归将极大地促进两岸莎学的研究与发展,达成两岸莎剧研究相辅相成、共同繁荣的局面。海峡两岸学者只有正视历史,联起手来,才能创造莎士比亚戏剧研究在亚洲的灿烂明天。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当代欧美戏剧理论前沿问题研究”(18ZD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孙宇,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张龙海,闽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①陈世雄:《戏剧人类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00页。